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

[法] 雷吉斯·德布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拉伯和德意志帝国的谈判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德意志帝国与阿拉伯人）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

[法] 雷吉斯·德布雷著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Régis Debray

CONVERSATIONS WITH ALLENDE

Socialism in Chile

NLB, London 1971

根据伦敦 NLB 出版社1971年英文版译出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

〔法〕雷吉斯·德布雷著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 字数 68,000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3171·104 定价: 0.26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和阿连德的谈话——智利的社会主义》，作者是法国新闻记者雷吉斯·德布雷。书中纪录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同作者的两次谈话。

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历任众议员、人民阵线政府卫生部长、参议员、参议院议长等职。1970年，他作为人民联盟所推定的总统候选人，竞选获胜，11月就任智利总统。他在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捍卫民族利益的政策。1973年9月11日，智利武装部队三军司令和警察首脑发动了反政府叛乱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总统同政变部队进行了坚决英勇的斗争，以身殉职。阿连德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本书作者德布雷是“游击中心论”的积极鼓吹者。他曾在《革命的革命？》等书中宣扬不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依靠广大群众，不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只依靠少数人的武装就能夺取政权的错误观点。1967年他到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所建的游击战营地进行活动，4月离开时，被玻利维亚当局逮捕，判刑三十年。1970年12月被托雷斯政府释放，随即会见了阿连德总统，那时阿连德执政刚两个月。

阿连德在两次谈话中，叙述了他的政治经历，着重谈了他执政前后的政局，阐述了他要在智利国内，“闯出一条新的道路”，

“通过选举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最近，智利的军事政变和阿连德的牺牲表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提倡的所谓“和平过渡”的荒谬理论对亚非拉人民反帝革命斗争具有多大的危害性。

本书前面德布雷所写的《导言》，以及书末附录智利左派革命运动全国书记处的《政策声明》（摘要），不反映阿连德的政治主张，故略去不译。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

1973年9月

我趁此机会向克劳迪奥·希门诺和奥古斯托·奥利瓦雷斯致谢，是他们的协作使本书得以写成；也向智利的革命领袖们和战士们致谢，是他们帮助我看清了他们国家的真面目。

雷吉斯·德布雷

目 录

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英译者彼得·贝格兰).....	1
注释.....	68

会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圣地亚哥。第二次在夏季的政府所在地瓦尔帕来索。人民政府已经在1月6日搬到那儿去办公，那一天阿连德总统在瓦尔帕来索市政大楼前主持了一次群众大会。

第 一 部 分

德布雷：总统同志，一个人掌了权后，会不会变呢？

阿连德：是啊，雷吉斯，过去人们常常叫我“阿连德同志”，可现在他们称我“总统同志”。很明显，我体会到这个称呼加在我身上的责任。

德：一个社会主义战士当了国家元首后，会不会变呢？

阿：不会。我相信，如果他真是个社会主义者的话，他当了国家元首后将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行动同现实不能脱节。

德：倒还没听说过会碰到一个掌权的社会主义者在情感和行动方面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者的本色，这一类的例子实在太少了，同志。

阿：据我所知，这偏巧是真的。而且，这种名副其实的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多。

德：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过去的事。你是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吧？

阿：是的！

德：那大概是在 32 年……

阿：说得准确些，是在 1933 年。

德：你本人的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基础是什么？你是怎样参加社会党的？

阿：我不是参加社会党，雷吉斯，我是创始人，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

德：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是个社会党人而不是个共产党人？”¹

阿：是这样的：我们建立社会党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但我们分析了智利的情况，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党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这样一个在哲学上和理论上——即以马克思主义态度解释历史——与共产党抱有相同观点的政党可以不受国际性的各种束缚。不过，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德：听说当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宗派主义……

阿：当时情况你很清楚。共产党当时的特点是闭关自守。我们认为当时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政党。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政党虽有与共产党相同的思想基础，但却具有比较远大的目光，能够完全独立，并且按照不受国际准则支配的标准，采用其它具体解决智利问题的策略。

德：我听说，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只存在了十二天。

阿：是那么一回事……

德：这是在智利……

阿：对，在 32 年。

德：你有没有卷进去？马马杜克·格罗维²的政变对于建党是否有影响？

阿：影响？影响大极了。

德：以后你碰到了什么问题吗？

阿：1932 年之前那个阶段，我被开除出大学。那正是在所谓伊巴涅斯独裁³期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它肯定不是典型的独裁统治，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温和的独裁，一种混乱的政府和混乱经济形势下的产物。正如通常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学生组织不得不对独裁政权进行勇敢斗争。我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这个缘故，我被开除出大学，并且被捕。

德：他们对你提出过诉讼吗？

阿：是的，我同五件案子有牵连，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在马马杜克·格罗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垮台的时候，我在瓦尔帕来索一家医院里当住院实习医生；我以一个学生领袖的身份在法学院发表了演说，结果被捕了。我家里的人也都被关进了监狱，其中有我的姻兄弟——他是马马杜克·格罗维的兄弟，还有我的一个兄弟，实际上他是根本不问政治的。你也了解，我家和格罗维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时，我们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后，被释放了。以后再次被捕，又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这次我们才经历了真正的公审阶段。当时我父亲的病情恶化，他的一条腿割掉了，另一条腿又发现有了患坏疽病的症状。实际上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和兄弟获准出狱去看他。作为一个医生，我很清楚他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只能和他谈几分钟的话。父亲吃力地对我们说，他所能留给我们的全部东西只是清白和正直的教养——他是没有什么财产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在葬

礼上,我许下了诺言,要献身于社会斗争。我认为我已经实现了我的诺言。

德: 还有些事我也很想知道。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理论家,但是在你的行动和演说中,分明有相当扎实的思想基础。所以我不知你是怎么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的。

阿: 说起来,事实上那时我还是学生,我说的是1926年和1927年我刚开始学医的时候,我们医科学生就是最进步的。

德: 比文学院的那些搞哲学和搞文史的“人文学者”还进步吗?

阿: 是的,医科学生是传统上最进步的。那时,我们住在贫民区,实际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来自各省。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阅读《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也读托洛茨基的著作。

德: 我想,据说你们和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读托洛茨基的书。

阿: 哦,我相信有人会对你说共产党不读托洛茨基的书,但我们却没有这样的限制。我很清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不过我根本是个讲究行动的人。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站在斗争的前线。这使我学到了很多東西。

德: 对,这就是常言说的“生活大学”,但书本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知识源泉。提一个具体问题:你有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阿: 当然读过。

德: 好,因为过一会儿我们可能讨论到它。

阿: 我在议会的多次演讲中都曾经引用过这篇著作的章节,结果引起了反动报刊发言人的非难,有一份叫《信使报》的报纸转载了我的一次演讲中和列宁书中的几段,以此来证明我别

有用心，当然是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啰。我认为《国家与革命》这类经典著作包含着一些基本性的概念，但这些著作是不能当作一种教理问答手册来使用的。

德：我常听说你同共济会有过联系，可是你又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晓得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度有过一场重大的争论。例如在二十年代的法国，共济会会员就从诞生不久的法国共产党中被开除出去了。你是否认为你和共济会的那种传说中的联系同你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阶级立场有矛盾呢？

阿：雷吉斯，首先让我提醒你，法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就是一个共济会会员。

德：对，对……

阿：只是到第三国际时期，这两个运动才确实变得水火不相容了。

德：对。

阿：呃，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我同共济会有过渊源。我祖父阿连德·帕迪恩博士是十九世纪时期共济会的一个“大师傅”。那时，当一个共济会会员就意味着卷进了斗争。共济会和劳塔罗会⁴都是当时独立运动和反对西班牙斗争的中流砥柱。

德：博利瓦尔和苏克雷也是共济会会员。

阿：不错。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传统，并且由于共济会运动是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原则而战斗的，所以我就保持了这样的联系。如今我在共济会运动中却主张：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会有平等，当然，甚至连平等的机会也没有；由于有阶级剥削，也就不会有博爱；而且真正的自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不瞒你说，我是按照共济会原则的真正内容来解释这些原则的。我完全明白，在有些国家里，共济会的所作所为不能算是同这些原则一致的。

德：总统同志，你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

阿：以正统的观念来说是这样，我出身于资产阶级。不过我要补充说明，我的家庭同资产阶级中经济上强有力的方面没有联系，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所谓自由职业者。我母亲的一家也是如此。

德：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呢？

阿：上个世纪，智利反保守主义的斗争非常激烈。这场斗争是在宗教战线上展开的。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进步倡议，例如兴办世俗教育。我所有的叔伯和我父亲都是激进党⁵的战士。那时，一个人只要是激进派，就意味着他持有进步的观点。我祖父创办了智利的第一个世俗学校，他的政治观点使他博得了“红色阿连德”的外号。

德：从那时以后……

阿：从那时以后，我的家庭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

德：原来家庭传统竟能影响你的教养。你是否记得还有别种影响呢？

阿：当我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时，我常到一个鞋匠铺里去闲逛。鞋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名叫胡安·德马尔契。我去听他谈天，并跟他交流彼此的看法。这是我在瓦尔帕来索初级中学念书的时候。放了学，我总是去同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谈天。他对我的少年生活起了很大影响。他大约有六十或六十三岁。他是喜欢同我谈的。他教我怎样下棋，给我讲生活的道理，并且借书给我看……

德：哪一类书？

阿：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些理论书籍，譬如说，象巴枯宁的著作。但对我最重要的还是德马尔契对这些书的评论，因为当时

我没有深入钻研的脾气。他以自修工人所具有的那种通俗而又鲜明的语言给我解释书中的东西。

德：我明白了。从那以后，你就开始了你的政治生涯。你是众议院议员吧？

阿：是的，不过开头我是学医的。我是学生领袖，后来，为了能在瓦尔帕来索的医院里工作，我不得不参加四项考试；虽然我是唯一的应考人，但是由于我做学生时的表现，就没有录取。我开始工作时是当病理分析助理，这说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很艰苦、很单调的。我必须进行尸体解剖。也还是在瓦尔帕来索的时候，我在工作外还从事战斗活动，我实际上就是瓦尔帕来索的社会党的创始人。我到过山区和郊区，还到过农村……

德：所以，当你回到瓦尔帕来索的时候，你又自由自在了。

阿：瞧，我常说，我的政治生涯是在瓦尔帕来索开始的，我是这座城的人，并且是来自瓦尔帕来索的第一个总统。

德：据说自从你当选为从瓦尔帕来索选出的众议院议员后，年纪很轻就当上了人民阵线⁶的部长。

阿：一点不错。我三十岁时当了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政府的一个部长。看！这张照片里的那个人就是唐佩德罗。他是一个人品出众的人，一个十分和气的人。说来真有意思，他同人民的联系起了作用，把他带到越来越激进的立场上来了。起初，他是个所谓“卓越”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家。之后，为了报答人民对他的真诚和热忱，他逐渐变成一个信心更强、同人民的愿望更加靠拢得多的人了，但是他一向只是个激进党人，从来也不想再当别的什么。这是人民阵线时期的事了。那时固然和今天一样，也还是那么几个政党，但是激进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却是占支配地位的党。这就使得今天的人民联盟和那时的人民阵线有所不同：在人民联盟里，没有一个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

党，但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阶级——工人阶级，而且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总统。

德：以后，你就继续留在议会里了，并且在最近几年里当上了参议院议长。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又有议会、共济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种种瓜葛，怎么能够在行动上贯彻一条始终如一的革命路线呢？既然你曾经同许多资产阶级机构搞在一起，再加上担任着现政府的总代表，你是怎样设法当上群众的领袖，革命事业的倡导者的呢？

阿：我经常想到这个问题。首先，青年时代精神上就有种抱负，后来就有真正为人民做点事的抱负。我是一个党员，一直是同群众一起工作的。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基层出身的智利政治家，很接近人民。雷吉斯，你应当记住，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出身于中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其中有些人虽然没有亲身感受过剥削的痛苦，但是懂得并体会到剥削是什么；他们在领会了剥削的含义后，就站到了被剥削者一边来反对剥削者。我经常是用我的政治立场去影响你所列举的那些机构的，而这一立场历来反映了人民争取社会公道的愿望。这也正是我现在所做

的事。

德：好，让我们换一个题目吧。总统同志，你今年六十二岁了。

阿：是的，经历不少的六十二年。

德：不妨说，你是属于贝坦科尔特、阿亚·德拉托雷、阿雷瓦洛这一流人物⁷同一辈的人。今天，这一辈在政治上已经风流云散了。他们现在是拉丁美洲史前的老一辈人了，不过你却却是当代史上的中心人物，而且还将影响拉丁美洲的将来。为什么他们都被人们一脚踢开，而你却在继续前进呢？

阿：瞧，你说的话相当厉害，但说的都是事实。事实是这样

的：社会党在成立了两三年之后，在智利召开了一次拉丁美洲人民党派的会议。那时候，有美洲革命人民联盟⁷和其他民粹派运动的代表到会，但明显的分歧已经存在了，因为社会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是绝对反帝的；那时，美洲革命人民联盟也自称是一个反帝的政党。事实上很遗憾。究竟怎么回事呢？当那些人民党派掌权了，例如“民主行动党”⁷在委内瑞拉掌了权，它们就缺乏那种进行必要改革应抱的积极态度，它们没有展开改变政权和制度的斗争，相反，它们倒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再拿美洲革命人民联盟来说，它没有掌权，但是在争取掌权的过程中，它冲淡了、削弱了并且改变了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结果，这些党派都被历史抛落在后面了。它们并不代表或者表达拉丁美洲人民的愿望。

德：你本人认识许多这样的领袖人物吧。

阿：对，全都认识。例如贝坦科尔特，就住在智利。他流亡到这儿来时，我正任唐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政府的卫生部长。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德：他在这儿时你帮过他忙吗？

阿：我们是朋友。他住在我家对门。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交谈。我得指出，他是个才思敏捷的人，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参加了社会党的不少集会。

德：我想，这儿往常挂着贝坦科尔特的相片吧？

阿：是的，但自从社会党和民主行动党破裂后，已经多年不挂了。

德：那是在什么时候？

阿：至少是十二年或十五年以前了。

德：什么时候帝国主义问题变成了你的一项课题？换句话说，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了你的反帝使命的？另外有些人从来